

回忆我在红一中

---写在高考恢复四十周年之际

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或南，或北；或文，或武；或汉，或夷；或盛，或衰；或成，或败；或定，或乱；从来没有像过去的这四十年，如此巨大的变化，如此快速的变迁，如此深刻的变革。技术的进步，知识的传播，财富的积累，前所未有。而这所有的变化，都源于那个时间结点：一九七七。对于我们来说，都源于那个地方：红一中。有幸能够见证千年一遇的历史变迁，并参与其中，我们真是幸运的一代。

七十年代中期的红安县城，好像只有一所红一中。从一小升到一中，也不需要考试，是县城户口就行。我进入了二班，所谓的文体班。既不会乐器，也不会唱歌跳舞。也许因为跑得比较快吧，曾经在运动会上得过 60m，100m 的第一名，和 200m，400m 的第二名，家里墙上贴满了奖状，不需要墙纸了。二班的班主任是陶宏开老师。说起陶老师，故事就多了。很多同学的哥哥姐姐都是陶老师教过的。所以早就听说他非常严厉。到了学校才领教到他的厉害。几乎每天下课后都要留校训话。没有特定的话题，从天文到地理，从科学到技术，从古代到现代，从文学到艺术，但归根结底都回到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做人的道理。学校每天四点钟放学，我们班一般都要到五点钟才能回家。六点钟放学是常事。几乎每天都这样。那时的班主任都是从初一一直带到高二。所以四年下来，陶老师的谆谆教诲真是比南门河深，比天台山厚。我们的三观也许就在那时形成了。听这么多教导，耳茧子都长出来了，不成才怪。陶老师知识面非常广，英文是他的主课，但语文和数学也教得很好。老师多才多艺，善歌善舞。一副美妙男高音，一手动听好钢琴。一有新电影，就组织我们唱电影插曲。记得那时电影‘闪闪的红星’轰动一时，老师自弹自唱主题歌“小小竹排”和“映山红”，印象非常深刻。还记得老师领我们全班一起合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啊就是好。铿锵有力，摄人心魄，恐怕邓老爷子听到都要躲着。老师带领我们排演过好几个大戏，记得有大型歌舞剧“东方红”，歌剧“洪湖赤卫队”，还有“杜鹃山”。每年参加全县文艺调演都获奖。但我只跑过龙套，也就是现在的路人甲乙，比如在“洪湖赤卫队”里演送信的赤卫队员。主角都是文艺尖子蔡莲，宁克建，张建伟，徐晓萍，王峰等演的。我一边待着，成了他们的粉丝。



七七年以前的政治运动是一浪接一浪，赛过金沙河后浪推前浪。先开始是学习张铁生如何交白卷；然后遵照五七指示搞开门办学，研究马尾巴的功能；接着又在无产积极专政下继续革命，调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完了又反击右倾翻案风，将邓老爷子批倒批臭；最后是批判四人帮，狂吃螃蟹。其间还穿插了各种小运动，比如反走后门，学习小靳庄，学习方和明团长能上能下，等等，不一而足。尽管一路过来政治运动很枯燥的，但我们二班的学生生活却是颇为丰富多彩的。比如搞开门办学，陶老师带着我们拉练去七里坪，住在一个村里帮老乡双抢割稻子。后来爬到一座高山上，山上长满了一人高的野生映山红，烂漫的花哟，开满了一坡，站在花丛里，那个愉悦的心情是无法言表的。据说，红军曾在那里阻击过白军的。陶老师经常组织我们勤工俭学。干得比较多的是摘柏树仔和冬青树仔，还有蒲公英。县城和周围的树都被我们摘光了，后来走了十来里路去化肥厂摘。树爬得老高了，奇怪没有一人摔下来。倒是后来班长宁克建上体育课从竹杆上摔下来把手折了，那时可算一件大事，记忆犹新。冬青树仔要先煮，晒干了才能卖钱。我们在教室前支起一只大锅，到处捡柴火，一煮就是三四个小时。滤干后摊在水泥地上晒干。几个月下来，居然卖了两三百元，作为班费用。在七十年代，这可是笔巨款。好像是用来买了一些乐器和道具。又买了很多礼物。每每组织开班会，玩击鼓传花的游戏，可以得到许多礼品。班里还常常组织集体看电影，像是青松岭，火红的年代，闪闪的红星，春苗，等等。还有许多朝鲜电影，比如，看不见的战线，血海，摘苹果的时候，卖花姑娘，等等。记得看卖花姑娘的时候，大家看到地主把小姑娘给她爹炖的药罐子踢翻的时候，全都哭了。只有我自己的泪点太高，居然没有流泪的感觉。是不是我对无产阶级的感情不够深啊？惶恐中，赶紧低头怕别人看见。最难过的就是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时候，本来就听不懂，还要一篇一篇地背主席的相关论述，还有张春桥的小册子，拗口得很，太难了。也就是那时，第一次听到按需分配和按劳分配的概念。一直不懂。直到现在才明白，按劳分配就是给多少钱干多少活；按需分配就是共享单车，共享房产。

学校后面的烈士祠，现在应该是红安的标志性建筑了。那时我们几乎每天早上都围着烈士祠跑一圈。学校还经常组织参观，并要求写作文。记得我们的作文总是能找到有这样的描述：天清气朗，风和日丽。通往烈士祠的路两旁，笔直地站立着高大的柏树，树下郁郁葱葱的青草，在微风里摇着头，好像在向我们点头致意。那时的烈士祠只有中间一座祠堂，旁边的棵子山麓有几块墓地。印象深的是有一座墓有墓碑却一直没有碑文。后来才知道那是沈泽民的墓。因为他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而二十八个半的头头是王明，不受意见，所以没有刻碑文。另外，他还有个大名鼎鼎的哥哥，叫茅盾。烈士祠和棵子山留下的记忆是忘不了的。

时间慢慢地挪到了一九七七年的九月份。我们开始上高二了。按惯例，一开学我们就准备去农场劳动学习两个月。记得动员出发的那天，夏红和我非常荣幸的被选为先遣部队，要求我俩当天下午先赶去农场，帮助农场的老师做准备活动。那时没有GPS，没有滴滴，也没有巴士，连地图都没有。我俩步行了四十里路，也不知道怎么就找到了要去的地方。来到农场的山脚，天已大黑。望着通往山上的小路淹没在黑蒙蒙阴森森的林子了，隐隐约约还听到狼嚎，我们小小的心立即害怕了，一致决定，就近找老乡家睡一觉。还好，很快就在一个村头找到一家人，吃没吃饭不记得了，只记得睡在稻草地上，晚上浑身发痒，感觉有虱子在咬。一大早，没打招呼就匆匆离开了老乡家。沿着山路，在树林里穿行。一路气喘吁吁，快到农场的地方，有个很陡的坡路，叫好汉坡。过了好汉坡，再拐几个弯，爬几个坡，穿几条沟，就到农场了。到了山上，见到常驻老

师，说明迟到原因，安排我们一大早去帮老师摘豆子。摘完豆子，走在半身高的草丛里，沾了一身的露水。回到营地，忽然觉得浑身发痒，一看，长了一身红苞，硬币那么大的，有点吓人。老师说是过敏。当即决定回县城看病。刚上山就下山，沿着大路往县城走。走着走着，觉得身上不痒了，再走一会儿，连苞也消了。忽然发现，陶老师带着大队人马迎面走过来。怎么办呢？回县城的话，苞没了怎么和陶老师解释？他不会说我逃避劳动吧？再调转头又觉得不合算？灵机一动改道走一条田间小路，避免和大部队正面接触。回到家后也没去看医生，休息了两天又回农场了。



在农场的干的活主要就是砍柴，锄地，收割芝麻。好像没让我们挖花生，要不我们还不是收一半吃一半。有时还去附近的村庄（那时叫大队）帮帮忙，联欢一下。记得有一次，深夜深一脚浅一脚走到一个村子里去慰问演出洪湖赤卫队。蔡莲演韩英，张建伟演刘刚。有一幕是韩英做刘刚的思想工作，将短褂披在刘刚身上。结果忙中出错，把地主的长袍大褂披赤卫队长的身上。急得我们跳脚。回去后笑得肚子疼。

秋季的农场，花生快要收获了。我们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花生不被野猪偷吃。白天好说，关键是晚上。当时我们分成两人一组，每天上半夜和下半夜都要有人巡逻。我们带着螺号，隔一段时间就吹一次号，以吓跑野猪。当时我俩胆小，不敢走远。就在离驻地五十米的山坡上，不断地吹呀吹。第二天，同学们和老师，一晚上没睡好，刚要眯眼，就听到号声，以后你们不要再值班了。

只要有陶老师在，生活就不会寂寞的。在山上，他经常带我们去采野黄花菜，摘猕猴桃和各种不知名的果子。晚上，大伙一起坐在石头上，一片漆黑中，只有天上的星星散发着微弱的光芒。陶老师拉着手风琴，我们一起唱着：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多有意境的夜晚啊。就是从来也没离家这么久，有点想家。什么时候能回家啊。

过了几天，出事了。老师在会上点名批评涂新年程真等班干部，晚上值班后，带头摘老师种的南瓜下面条吃。涂新年辩解说只不过是南瓜奶头而已。老师当即批驳，还没长成瓜，就更不能摘了。后来涂还写了个检讨。也难怪他，那时在农场真的没菜可吃。从来闻不到肉腥的，就是蔬菜也都是我们从县城带过去的，几天就吃完了。山上两块地种的蔬菜都是给老师吃的。同学们每个人自己带一罐咸菜，要吃两个星期。我带的一瓶豆酱一星期就吃完了，只能吃白饭。有一次从农场回到家，妈妈煮了大半锅花生红枣糯米饭。那个香啊，没有挨过饿是体会不到的。吃了一碗又一碗，实在太饿了。到了半夜，发生严重溢出现象，上吐下泻。妈妈站在旁边直笑，好像没有一点同情心。

山中一日，山下一年。十月下旬回到县城，忽然间觉得气氛迥然不同。先是电台和报纸都发表了恢复高考的通知。然后听到教育部决定七七年全国招生考试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十二月三日举行。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上学习文化的气氛陡然变得浓厚起来。到处搜寻数理化的教材。连我几十岁的老爹和他的局长同僚们，都想开始学习英语了。紧接着，一中陈书记宣布重新分班，文理科分开。我被分到高二（1）班，班主任是陈定行老师。过两天，又接到学校通知，六位在校高中生将参加十一月份的高考。不记得其他人了，只记得有夏献民，徐旭煌，胡益群，和我。我们虽然是高二，可是高二的课程还没有开始学呢。连三角函数都没接触过。结果第一批的初录通知没有一个在校生。过了一个星期，我忽然接到通知参加体检。后来听一中曾校长说，考卷复核时给我补了六分，刚好上线。可是卷子上没有名字，他怎么认出来呢？反正，最终还是没有被录取。后来发现七七年考上的在校生极少，录取的几乎都是一色的知青和老三届，还有很多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记得七里坪有位三十多岁的下放知青，他的父亲好像是右派，七七年考上了北师大，政审时还折腾了一番。父亲后来特地让我去见他学习点考试经验。从后来的媒体看到，当年参加高考的一共五百七十万人，录取率为3.4%。因为七七级是一月份入学，所以到八一年的时候，有半年时间，所有大学都没有足够的宿舍给学生住，因为实际上同时有五届学生在校。我读书的大学里有很多新生都在大礼堂和体育馆里开地铺。



新年后就开始真正准备高考了。其实没有任何特别的备考手段。只是按部就班上课，研习课本里的习题。用的课本是 1973 版的，是邓老爷子在台上整顿国民经济时制定的比较好的一套。后来的课本很多都是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太实用。没有任何复习资料，更不用说补课了。后来。我的同桌王峰借给我一个油印的复习资料，算是唯一的课外辅助材料。早上六点开始自习，晚上一般都到十一点才回家，还常常停电，点着蜡烛夜战是常事。熬到六月份，作为真正的应届生参加高考，结果中了。记得高二（1）班同时考上的还有胡益群，徐旭煌，吕鑑全，刘伟民，夏献民，涂新年等。程真也考上了，但他选择了去当空军飞行员，我们全班还敲锣打鼓去他家欢送。我们的化学考得都很好：夏献民得了 100 分，好几位都得了 97 分。后来教我们化学的蔡伦祥老师也以此为契机转政界了。不知是不是和这有关系。我们都非常幸运，参加过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头两次考试，而且都顺利升学。当年没考上的同学经过复读后，很多都先后都考上了大学。

白驹过隙，时光飞转。我先在“阶级斗争很复杂”的广州度过了鸟语花香的四年，然后又在灰头土脸的天津助教了三年，后来又在紫金山下丛林里逍遥了三年。这年夏天，回到长大的红安县城探亲后准备回广州开始新的生活。座在巴士上等车启动，迎面走来一个熟悉的面庞。“这不是那个谁吗？”我说。他也认出我了，我们是一中多年的同班。寒暄之后我问他去哪里。“我去武汉钢铁学院。”他说。“你在那里当老师吗？”我问。“不是的。我刚考上。复读了一年。”他面露喜色。我真诚地祝贺着他，心里暗自感慨：中国人的高考情结啊。其实那时他才二十六岁。而我有在大学的同学入学时已经二十九岁了。我真的很佩服他的坚持。



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我们爱戴的陶老师也离开了红一中，到了华师做研究生改学历史。后来又到了美国研究比较教育，再后来从事天才少年教育。回国后投身中国青少年素质教育。现在是全国有名的治网瘾“大咖”。偶尔看到喷子们在陶老师的微博留言，嗤之以鼻。我自己则于

一九九二年远赴美国攻读博士。后在伊利诺伊州一家建材公司任职至今。很惭愧，没能为祖国的建设做贡献。但我能保证我买的东西多半都是中国制造。

离开红一中已经有四十年了，离开中国也已经二十五年了。我常坐在躺椅上，聆听着唧唧鸟鸣，仰望着聚散不定的浮云，心想：我们这代人经历的变化，堪比历史上任何朝代几百年的变迁。这些变化都源于那个伟人。他的伟大，在于他接地气，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在于他有远见，知道未来最需要的是什么。单凭他七七年果断决定恢复高考这件事，就可以让他名垂青史；更遑论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堪与中国历史上任何帝王将相相提并论。在这高考恢复四十周年之际，让我们纪念那个年轻时反复批判过的名字：邓小平。

曹邦继 草于芝加哥

1978年毕业于红安一中